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西方中国古代史 研究导论

[中]胡志宏 / 著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西方中国古代史 研究导论

「中」胡志宏 /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胡志宏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2. 9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海外汉学研究/任继愈主编)

ISBN 7-5347-2824-X

I. 西… II. 胡…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330 号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海外汉学研究

著 者 胡志宏

责任编辑 张 锐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电话:0371—5726194)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09 千字

印 数 1-1 550 册

定 价 23.20 元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

①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导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目录

□第一章 西方汉学早期发展脉络	(001)
一、19 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	(001)
(一) 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	(003)
(二) 早期的汉学与历史学	(005)
(三) 欧洲中国观的转变	(010)
二、19 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兴起	(011)
(一) 汉学讲座的建立	(012)
(二) 四个主题与 19 世纪中期汉学环境的变化	(017)
三、20 世纪初期汉学的跃进	(022)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汉学	(031)
(一) 美国汉学的兴起与区域研究	(031)
(二) 欧洲先进史学带动下的汉学	(044)
五、概念与反思	(052)
注释	(057)
□第二章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060)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讨论	(060)
二、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	(073)

三、华裔学者的贡献	(081)
四、史学理论与汉学研究	(090)
注释	(108)
□第三章 西方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112)
一、皇权的实质是什么?	(113)
二、政府、官僚由什么人组成?	(123)
(一)文官制度研究的史的考察	(124)
(二)霍尔的回答	(134)
三、政府和地方组织的关系怎样?	(145)
注释	(168)
□第四章 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上)	(172)
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172)
二、古代社会	(179)
三、中世纪社会	(201)
(一)汉学中世纪史研究的理论资源	(201)
(二)从浦立本到以崔瑞德为代表的唐史研究	(212)
(三)姜士彬和伊沛霞的世家大族研究	(218)
(四)中国中世纪早期史研究	(227)
注释	(237)
□第五章 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下)	(242)
一、唐—宋近代社会说	(245)
二、明末近代社会说与清中叶近代社会说	(258)
三、帝国后期的社会精英与地方社会史	(262)
四、静态的社会史和个人史	(273)
注释	(282)
□第六章 西方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285)
一、何炳棣的农业起源研究	(285)
二、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与陈启云的批评	(292)

三、宋代的发展	(306)
四、宏观的认识、实证研究和新规范	(313)
注释	(325)
□第七章 宗教史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	(328)

一、为什么在中国难以进行西方式的宗教统计?	(328)
二、早期宗教、民间宗教和鲁惟一的两汉文化研究	(333)
三、陈启云提出的哲学史两个线索	(343)
四、巫鸿与武梁祠研究	(348)
五、杜德桥的贡献:文学、宗教和社会史的整合	(353)
六、结语	(361)
注释	(364)
□致谢	(367)

第一章 西方汉学早期发展脉络

一、19 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

西方汉学的源头是欧洲汉学。欧洲人最初从传说里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中国,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魅力,欧洲人对人类的童年文化很感兴趣,因此非常向往中国,无意中形成了敬慕古老的中国文明的风气,到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达到高潮,后世的汉学家称之为“亲华热”。

最早到达中国的多为南欧和西欧的沿海国家人士,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他经欧亚大陆陆路到达元朝大都,为元朝廷工作 17 年后,从海路返回威尼斯,向欧洲人渲染了中国的物质文明。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这时已传到欧洲,中国的园艺、建筑、戏剧等物质和精神产品也已成为世人所知。到 17 世纪欧洲“亲华热”达到高潮时,欧洲人在很多方面采纳和模仿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如用中式花纹和图案装饰建筑物、家具、瓷器。后来,英国人甚至在伦敦西部皇家植物园里建造了一座十层中式宝塔;法国的“汉风”也曾轰动一时,巴黎曾上演戏剧《中国孤儿》,一度把中国当做歌舞升平、法律有度的典范之地。再后来,亲临中国的人越来越多,目睹了中国贫穷落后的一面,汉风不再盛行,但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里始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印迹。

16 世纪至 18 世纪,欧洲的耶稣会士作为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的集团,大量派人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传教,抵达中国时适逢明朝中叶,耶稣会士在中国创办学校,讲授拉丁文、希腊文及文学、历史、地理知识,传播宗教学说与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把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诉诸文字传回欧洲。由于交流的载体已从器物演变为文字,因而形成了最初的汉学。后人在总结汉学发展史时便把这个时期概括为“传教士书简阶段”。

总结欧洲汉学早期发展的论述很多,近年来较具权威性的文献可以以《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①(*Europe Studies China*)为代表。该书收集了提交给 1992 年 4 月于台北举行的“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 29 篇论文,作者多为欧洲著名汉学家,分别从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艺术领域和汉学史上代表人物的角度总结了欧洲汉学,其中的四篇对于完成介绍汉学领域中的史学成果的重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本章的论述将多次引用其论断、观点和史料,这四篇论文分别为:

《中国研究:欧洲汉学史简评》^②,作者为德国巴伐利亚学术院教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主编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20 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③,作者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晚清史专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aière);

《欧洲的中国史研究》^④,作者为移居美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瑞典汉学家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

《中华帝国早期史:西方学者的贡献》^⑤,作者为《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系鲁惟一(Michael Loewe)博士。

众所周知,法国汉学在早期的欧洲汉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领先地位,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和汉学活动是欧洲汉学史里最为活跃的篇章,因此,专门总结法国早期汉学的文献对于本章的写作极为重要。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介绍法国汉学的工作在了解和研究欧洲汉学的整个领域里也处于成果最多的位置,近年出版的《法国当

代中国学》一书虽以介绍当代法国汉学为主,仍包含了著名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的《法国汉学研究史》^⑥一文,此文与傅海波等四位学者的论文交互呼应,提供了欧洲早期汉学发展重要的轮廓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介绍海外汉学的力度加强,出版了多种工具书、译著、研究专著和丛书,其中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一辑开篇未署名“前言”的第一段话为宏观地认识整个汉学提供了手笔很大、文字又很精练的论述,由于这段话对认识欧洲早期汉学极有启发,故引述如下:

“从公元前一二百年起希腊人得知东方有个‘赛里丝国’(丝国)至今漫长的两千多年来,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逐渐克服了地理、语言、文化、社会心理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隔绝,经过了山海经式的传说阶段、马可·波罗和伏尔泰的传教士书简阶段、翟理斯和考狄尔的人文科学第一阶段及沙畹和马伯乐的人文科学第二阶段,走向了今天以李约瑟和施坚雅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阶段。”^⑦

(一) 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

欧洲本土的“亲华热”伴随着耶稣会士的宗教热情,欧洲人不必亲临中国,从耶稣会士的作品就可以了解中国。耶稣会士在中国最活跃的时代恰好处于傅海波所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发展到了“发现的时代”,后人从这个时代看到以好奇心和求知欲为代表的世界精神。

耶稣会士使欧洲人了解了中国,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汉学家,根本的动机是传播宗教,研究中国文化只是传教的手段。但是强烈的宗教热情使他们迸发出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长期居留于中国学习艰涩难懂的中文,借熟读古文、经书与中国士人结交,甚至加入中国官员队伍以便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热衷于把儒家学说与天主教义融而为一等等,耶稣会士的全部活动全为一个目的,即完成宗教使命、促使中国人信奉欧洲宗教。

但是传教士的活动形成了事实上的早期汉学,其成果不仅限于

传回欧洲的文字和作品,他们进入中国以后的活动和摸索都对致力于认识中国的同道和后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经历在早期汉学史上即为有代表性的一例。利玛窦居留中国近三十年并逝世于中国,当代中国人在利玛窦墓(位于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前停留时很难不因他与众多同仁长眠于此的献身精神所动。利玛窦为欧洲汉学留下了明末中国的第一手史料,但是他初到中国时也曾经历过很多波折。最初他以为以佛教徒的面目出现会易于为中国人接受,但是他发现在中国南方,佛教徒并不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脱下僧袍改穿商人衣服,最后他终于认识到应该去北方接近朝廷和绅士、官员阶层,为此他不懈地学习中文,熟读儒家典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谋得明朝廷官职并在此基础上宣传基督教教义。利玛窦的基本策略是避免激怒中国人仇视欧洲宗教,因此成功地深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入中国社会的最高层,同时当上了罗马教会派驻北京的第一任代表^⑧。

利玛窦在中国朝廷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接受中国礼仪,因而与朝廷达成和谐共存。但是这种做法遭到激进的欧洲宗教人士的反对。1715年,罗马教皇明令取消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禁止他们按中国礼仪行事,结果中国皇帝被激怒,于1774年下令解散耶稣会士传教团。到19世纪,在中国传教的已经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这时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国已成为负面形象,同时,新教传教士采取了与耶稣会士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狭隘兼生硬。

美国当代汉学家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在《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和中国学的起源》^⑨(*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一书里追溯了汉学产生时期耶稣会士的作用。孟德卫非常珍视灵活的、感情渗透的方式,描述了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人习俗、风尚的做法,如参加尊孔、祭祖等活动,并把它归结为一种策略。耶稣会士似乎是天然的人类学家,实践

使他们认识到两种文化只有处于平等地位才能互相借鉴和吸收,因此能成功地吸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自己则以成为“中国通”而自豪。孟德卫还揭示了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为现代中国学奠定的基础,他着重指出,“17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是耶稣会士发中国的史料性报道及他们发表的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著作”,而“17世纪欧洲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领域是历史年代学和语言”(见注⑨)。

耶稣会士的汉学成就给欧洲人带来的收益可以用傅海波的一段话进行表述:

“中国文明的伟大时代,它代表的稳定和强烈的物质文化引起了一种信念即非基督教教义也能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中国成为由智慧的皇帝和哲学家领导的那一类国家的代表。”(同注②)

这段话不仅表明中国文明使欧洲哲学和宗教界发现了新的参照系统,还对中国文明和政治制度的特点作了睿智的概括。同时,笔者认为,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为处于“发现的时代”的欧洲知识界增加了学养。这种策略与现代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有或隐或显的联系。人类学家长于深入被西方国家视为落后的地区或民族住地进行考察,对种族中心主义偏见产生的流弊比较敏感,他们移情于被考察对象,用参与的方式与被访者融和,取得近经验和真知识,这就比用冷静的心态从文献入手进行分析、研究的历史学家更容易窥透研究对象的底蕴,取得突破性成果。当代汉学成果在欧美现代历史科学产生以后才得以形成,治中国史的汉学家的必修课之一即历史人类学。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与17世纪的耶稣会士遥相呼应。

(二) 早期的汉学与历史学

耶稣会士时代汉学活动的地点主要在中国,但是其成果显然成为欧洲汉学的起点。这些成果按照巴斯蒂夫人的归纳主要为三项:第一是大量的翻译工作,主要表现为中国古文典籍和文学作品的西文译本;第二是纪实性作品,如游记、出使报告、经商的记录和文件、日记、书信等,这类作品使许多没有去过中国的欧洲人对汉学产生兴

趣;第三即耶稣会士给欧洲送去了最早的中文藏书。这些书籍大多为17、18世纪中国皇帝的赠品,包括编年史、正史、传记、古籍汇编、百科全书、地方志、法令、法规、仪典和古地图,收藏在欧洲4个著名的大都市里: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见注③)。

纪实性作品的作用自不待言,它促使一些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加入了汉学工作者的队伍,还提高了欧洲公众对中国的兴趣,当年的作品最起码获得了新闻报道上的效果,今天则成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藏书,在当年是欧洲汉学生存的基本条件,经过学院式的保存和整理,欧洲汉学才谈得上初具规模。时至今日,几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藏书已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全球范围共同财富,由于许多版本在中国已经失传,有些中国学者不得不专程赴欧洲收集珍藏孤本,辑佚成册,比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李孝聪辗转欧洲各国数月,回中国后辑成《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耶稣会士进行的三项工作中引起后人产生的非议集中在如何评价当年的翻译作品。事实上不仅在耶稣会士书简阶段,即便在19世纪正规的学院式汉学产生以后,欧洲汉学成果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必要的中国哲学、文学和史学典籍的西文译本。它们既是各种课题研究的基础、引文的来源,也是初入汉学的必读书,即便是中文非常优秀的学者或学生也要借助译文迅速进入某一课题的语境,了解较多的背景资料,进入论文、论著的写作过程以后,有了好的译文,就不必在引用原文时重新翻译一遍。因此,译者的贡献非常重要,在汉学产生初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尤其重要。翻译家皓首穷经,用毕生精力为汉学做了铺垫的工作,但是在他们进行工作的时代,历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历史学本身的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当代学者用现代的标准衡量那个时代汉学家的工作,就会提出看起来十分残酷然而却不无道理的批评。移居美国的著名瑞典汉学家毕汉斯在欧洲汉学史学术会上提出:

“耶稣会士是重要的中介人,但他们并没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历

史的理解,他们选用的史料也有限。当汉学逐渐成为欧洲主要大学承认的学科时,致力于汉学的人主要的工作是翻译。恰当地翻译很难的文献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译文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有教育上的效果。但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比在一个时期内普及知识更重要。……我们不再需要沙畹和德效骞,因为我们能阅读原著。但是能读书并不能导致对史料产生自动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史学方面的训练。”(见注④)

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才属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史学训练的内容是什么?毕汉斯从史学家发现和破坏史料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认识,并概括了研究活动的三个步骤:提供史料,进行文献批评,提出适当的问题。现在看耶稣会士触及的史学问题即是耶稣降生相当于中国哪朝哪年这样的问题,利玛窦曾发现犹太教传入中国开封市,但他始终未能考证出具体的年代。生活在以哲学、神学和宗教研究为重心的欧洲文化和学术环境里的汉学家初入中国研究领域首先注意经学、佛学或老子、庄子,这是很自然的。了解一种外国文化最先注意它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中国的人文学者多从文学和叙事史学的作品入手进入某个学术问题,阅读文学作品也常从近代文学一段一段上溯至古典作品及至深奥的断简残篇。总之,在耶稣会士时代的汉学里看不到凸显的史学研究,这与当时欧洲学术文化的大环境是不矛盾的。

傅海波在欧洲汉学史国际会上的演讲是开局第一篇,他简要地介绍了汉学初起的年代里欧洲各国不同的情况。众所周知,欧洲汉学的发轫与传教活动相联,但是宗教目的并不是惟一的因素,汉学的兴起也缘于欧洲列强工业革命以后海外扩张、贸易和殖民统治的需要。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16世纪就从海路抵达菲律宾和澳门,但西、葡两国并未出现汉学的发展。荷兰从17世纪起称霸海上,成为扩展海外贸易的新锐,后来在东南亚夺取殖民权力,长期以来荷兰汉学在欧洲各国处于领先的位置。俄国汉学是欧洲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俄国自身历史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格局,俄国汉学

总不能得到欧洲学界的关注。俄国重视中国研究,这很容易解释。俄国人自17世纪进入西伯利亚,与中国共同拥有长达数千英里的边界线,俄国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欧洲国家,因此有鲜明的利益驱动研究中国和满族。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派出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北方,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留下的文字资料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傅海波认为英国人长期不间断的汉学研究缘于三重动机:传教、贸易和殖民统治。在傅海波看来,德国人治汉学的动机最为纯粹,德国学者具有特殊的、超越世俗利益的学术好奇心,在德、中之间没有贸易关系的时代、在治汉学的学者得不到教授头衔的时代,德国汉学就已经取得了不凡的业绩(见注②)。

不过,无论是身为德国人的傅海波还是其他欧洲学者都公认法国汉学是早期欧洲汉学里最先锋的部分,巴黎被誉为“西方汉学之都”(见注⑥)。法国人研究汉学的动因起码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德国人相似,即不完全由于殖民扩张的需要,耶稣会士不仅承担着传教的重任,他们也是最早接受和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知识的学者。法国政府自17世纪以来通过国际性的耶稣会组织得到在中国传教的地盘,建立了法国传教区。法国耶稣会士继承了利玛窦的策略,努力与中国朝廷和统治集团建立联系,接近、了解并研究中国文明。戴密微认为法国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最初使命是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而不是宗教,因此他把1685年六位获“国王数学家”称号的耶稣会士乘船赴中国这个历史事件当做法国汉学创立的标志(见注⑥)。康熙皇帝对六位数学家介绍的西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还明确承认法国传教士在同俄国签订条约的外交使命中的功绩、在军事和科学技术方面为皇朝做出的贡献。康熙皇帝还满足了法方人士的要求,为他们延师讲授中文和满文,在北京建一座教堂并允许其他传教士来中国。

19世纪以前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按照巴斯蒂夫人的评论,以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神父和冯秉正(J. F. M. A. de